

最好的慈善应是不断地追求终极目标

——去追根求源、去根治邪恶。

约翰·D·洛克菲勒

沉默的伙伴

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研究



李 铛◎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沉默的伙伴

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研究

李 韶 著

◎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伙伴: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研究/李韬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087—2271—9

I. 沉… II. 李… III. 慈善事业—基金会—研究—美国—现代
IV. D7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0890 号

书名:沉默的伙伴: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研究

著者:李 韬

责任编辑:张利平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传:(010)66051713

网址:www.shcbs.com.cn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165mm×235mm 1/16

印张:15.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序
言

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能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拓性的研发及技术创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高达80%。^①在世界经济论坛于2007年10月发表的《2007至200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美国以其创新思维及优质大学，居全球竞争力的首位。美国人的制度创新和思想创新，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尽管一些“创新”(如武器的创新)未必服务于人类之共福。

就创新而言，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创新动力更多地来自公民社会而非政府。从政府层面看，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共和制等政治原则，以及据此建立的总统制、联邦制、代议共和制相结合的国家制度，使美国成为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从非政府层面来看，由众多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繁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为“市民社会”)是一个无形的巨大网络，成为国家同个人相联系的中介。公民社会中各种自愿结合的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既阻止国家权力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公民社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还独立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组织，其行为体包括慈善团体、教会、社区组织、社交俱乐部、民权游说集团、家长—教师协

^① 参见孙辉：《美国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优势》，《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6年第8期，第15页。

会、工会、贸易商会，以及许多其他部门。公民通过它们广泛地参与政治、教育、文化和其他公共事务，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对立法、司法和行政提出建议，实施监督。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许多重要法令和政策，都是在有某种组织的社会运动的持续压力之下出台和完善。公民社会既是美国民主制度存在的根基，也是美国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的主要矫正力量。

非营利组织特别是慈善基金会，对于美国的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和技术创新，贡献巨大。我国学者资中筠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详细考察了一些美国基金会在科学研究、教育、社会发展、政策制定中所做的贡献。^①

李韬博士对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关注与研究，始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2001-2004年）。在他开始此项研究时，国内尚未出版这方面的学术专著，相关论文也是凤毛麟角。李韬利用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认真刻苦地完成了这一专题博士论文的写作。其后又补充修改了一些内容，写出了这本专著。

本书选择了慈善基金会这一美国政治中“沉默的伙伴”作为其研究目标。在众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慈善基金会就是济危扶困的社会机构。像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等，实际上是政府机构主导的慈善事业单位；而近年来一些企业或企业家所创办的慈善基金会，也是直接面向困难群体和个人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却与此相去甚远。它们通常并不对弱势群体和陷入困境者直接施以援助。绝大多数的美国慈善基金会，尤其是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型基金会，所关注的是造成贫穷与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们捐资支持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研究，以及关于解决之道的探索。

本书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

^① 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究竟是怎样的机构？其性质与宗旨是什么？它们与我国的慈善机构有何异同？

为什么现代慈善基金会在美国如此繁荣，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却甚发达？

慈善基金会是怎样推动美国教科文卫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它们为化解国内族群矛盾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慈善基金会为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推进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做了些什么？

作为非营利组织，像福特、洛克菲洛和比尔·盖茨等拥有巨额资金的基金会，是如何通过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管来防治腐败的？

既然慈善基金会为美国的发展与稳定做出了贡献，它们在美国所得到的评价为何不是一片赞扬之声？美国社会对它们有哪些不同认识？

李韬虽没到过美国，却能对远隔重洋的美国慈善基金会做出如此透彻的研究，实属不易。如果他能够有机会做一番深入的实地考察，相信本书会更其实感。瑕不掩瑜，本书还是为我们找开了一扇观察美国的新窗口。在当今中国，公民的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维权意识增强，公民社会的概念开始浮现，大批志愿者正在服务于社会，民间慈善机构也日益兴旺发达。因此本书的出版恰逢良机。相信它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慈善基金会，从中找出可资借鉴之处，避免可能发生的弊端，从而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王缉思

2008年大暑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言	(i)
绪 论	(1)
第一章 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	(13)
第一节 慈善基金会的界定.....	(17)
第二节 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及特点.....	(21)
一、独立性.....	(24)
二、稳定性.....	(26)
三、中介性.....	(28)
四、国际性.....	(29)
第三节 类型各异的慈善基金会.....	(31)
一、独立基金会.....	(33)
二、公司基金会.....	(34)
三、运作型基金会.....	(36)
四、社区基金会.....	(38)
第二章 现代慈善基金会的缘起与发展.....	(47)
第一节 慈善基金会的缘起.....	(48)
一、历史渊源.....	(49)
二、宗教与文化传统.....	(57)
三、时代与社会背景.....	(63)
四、慈善抵税与追求名誉.....	(70)
第二节 慈善基金会的发展.....	(72)
一、慈善基金会的兴起与初期发展 (1889—1929)	(73)
二、大萧条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发展 (1930—1945)	(75)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	
(1946—1980)	(76)
四、20世纪末期慈善基金会的发展	
(1981—2000)	(78)
五、21世纪初的慈善基金会	(80)
第三章 慈善基金会的国内行为	(83)
第一节 支持美国的教育事业	(84)
第二节 推动美国的科技进步	(95)
第三节 资助美国的文化艺术事业	(103)
第四节 发展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106)
第五节 关注美国的种族关系	(114)
第六节 服务美国的普通民众	(121)
第四章 慈善基金会的国际行为	(125)
第一节 推进全球文化传播	(126)
第二节 促进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139)
第三节 关注世界粮食与人口问题	(152)
第五章 慈善基金会与美国政府	(163)
第一节 慈善基金会的设立与管理	(164)
一、慈善基金会的设立	(164)
二、慈善基金会的管理	(168)
第二节 慈善基金会与政府的互动与合作	(177)
一、与政府间的人员交流	(178)
二、参与政府的海外项目	(182)

第三节 慈善基金会与国会的矛盾与 冲突	(186)
一、沃尔什委员会的调查	(187)
二、考克斯委员会的调查	(190)
三、里斯委员会的调查	(193)
四、帕特曼委员会的调查	(194)
结 论	(199)
▼	
参考文献	(203)
索 引	(221)
后 记	(237)

绪论

在新世纪，回首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人类既享受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也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空前劫难。在 20 世纪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风云变幻中，有很多现象值得人们去关注、去研究，美国的崛起与持续繁荣就是其中之一。

到 19 世纪末，经过不断地开疆拓土，建国仅一百多年的美国就已经成为地接太平洋与大西洋，面积占据了近半个北美大陆的幅员辽阔的大国。与此同时，美国还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实力大为提高。经济实力的提高又促进了美国的科技与军事力量的发展。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由一个普普通通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大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烧到美国本土，而战争的需求又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外，美国的两次参战对改变战争的进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威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都与自己的利益相联系，开始称霸全球。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有人断言，20 世纪将是“美国世纪”。^①

① 最早提出“美国世纪”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亨利·卢斯 (Henry Luce)，见 Henry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in Michael J. Hogan (ed.), *The American Legacy: U. 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奥利维尔·如恩斯 (Olivier Zuns) 在其所著的《为什么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一书中，对这一概念又加以了详细论述。

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谋取全球霸权、建立和巩固自己在全球的“领导”^①地位，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规制的制定者。“美国以它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不断创新‘领导’了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乃至品位习俗都向‘美国化’发展。……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②为了避免自己被“淘汰”、为了能够赶上乃至超过美国，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都在积极开展对美国的研究，希望能从美国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中找出自己国家的发展可资借鉴的东西；希望加深对美国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使得“美国研究”成为 20 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得以繁荣、强大的原因很多，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稳定的政治制度、多样的文化、乃至多样的种族，等等。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治霸权、经济扩张和军事威胁感受至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美国内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所以，对美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些方面。弄清楚这些因素的运作过程及相互关系，就能更好地认识美国内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从整体上认识美国内外政策演变的原因与规律。但是，要真正了解美国，仅仅关注和研

① 在汉语中，“领导”一词的英语对应词是“lead”，但这两个词在各自语言中的深层含义略有不同。汉语“领导”一词的意思是“率领、担任领导人”；而英语“lead”一词既含有“率领、引领”的意思，又含有“领先、率先、通往、导致”等意思（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和《新英汉词典》）。所以，当美国人宣称，美国要“领导”（lead）世界时，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美国要做世界领袖；而美国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理解。这种差异有时会引发中美两国媒体之间的笔墨之争。

②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 28 页。

究这些凸显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认识到，美国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包容了几乎来自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居民；同时，美国还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在美国的政治运作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的精英人士认为：多元政治有助于形成集体共识、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多元政治可以用来防止由大众社会、大众传媒和具有超凡感召力的领导人所导致的形形色色的、非民主的政治行为体。这也就是说，仅就美国政治运作而言，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有政府、国会、政党等核心的因素，其他很多因素如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宗教社团、思想库、基金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美国政治发挥着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虽不像政府、政党、国会等因素那样直接、明显，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的影响无关紧要；恰恰相反，这些因素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大众传媒历来是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力量，被称为与美国分权制衡制度中的三个政府权力部门相并列的“第四”权力，它是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监督因素，还起着引导民众情绪的作用。新闻媒体在“水门事件”、辛普森案件、克林顿总统“绯闻案”和反复出现的大肆“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明证。再有文化和宗教，它们塑造了美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这种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①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中介力量，慈善基金会同样也是美国多元政治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慈善基金会在美国之发达、规模与影响之大，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组织或机构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作用巨大，这种作用要大过其财富，

^① 有关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请参见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页；刘澍：《当代美国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创办人所能想象到的程度。”^①“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②实际上，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捐助了大量的科研、文教、卫生、社会公益等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就中国而言，20世纪初，刚刚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就创办了“中华医学理事会”（China Medical Board），积极开展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斥巨资在中国北京筹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心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Medical School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为范本，将北京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的医学院校。此项目共计历时32年，直至北京解放前夕才终止，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有海外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项目。^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对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中美建交后，尤其近十多年来，美国慈善基金会在华的影响不断增加。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慈善基金会又恢复了在中国的活动，资助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出国进修、中外学术交流以及学术著作的出版等项目。

虽然人类慈善行为的历史可以上溯几千年，现代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的兴起与繁荣也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对慈善基金会的研究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在美国出现的，8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学者所关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金会创立之初各自独立运作，

① Mark Dowie, *American Foundations: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1), p. xxi.

② Edward C. Lindeman, *Wealth and Culture: A Study of One Hundred Foundations and Community Trusts and Their Operations During the Decade 1921—1930*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1st Edition, 1936; Reprint, 1988), p. 20.

③ 详见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89页。

相互之间很少合作，也很少分享信息，局外人难以了解到有关它们的信息，所以早期关于慈善基金会的文章及著作多是慈善基金会的业内人士所为。专门研究基金会的最早的著作要数 1930 年出版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The Foundation: Its Place in American Life*）^①一书，这是由连续担任卡内基基金会会长达 19 年之久的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Frederick P. Keppel）撰写的。在该书中，凯佩尔介绍了早期慈善基金会的性质、运作方式及其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这一时期另一位对慈善业加以研究的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爱德华·C·林德曼（Edward C. Lindeman），他著有《财富与文化：1921—1930 年间 100 家基金会与社区信托基金研究》（*Wealth and Culture: A Study of One Hundred Foundations and Community Trusts and Their Operations During the Decade 1921—1930*）一书。在此书中，林德曼对依据名声所选择出来的 70 家基金会的 402 位受托人（董事）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探讨了财富与文化的关系。此二人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研究基金会的人。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仍然如此。像《慈善基金会》（*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公司基金会研究》（*A Study of Company Sponsored Foundations*）以及《慈善捐献》（*Philanthropic Giving*）等，在当时影响较大的研究慈善思想和慈善基金会的作品，全是曾经担任美国基金会中心（The Foundation Center）主席的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Frank Emerson Andrews）的作品。其中《慈善基金会》一书对当时慈善基金会的状况、慈善基金会的设立、如何申请捐助、慈善基金会的活动领域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开了慈善基金会综合研究的先河。

20 世纪中期，因慈善基金会的活动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美国国会组织了对慈善基金会的几次调查听证，这些调查不仅没有给慈善基

^① 此处所论及的文献资料的相关信息将在参考文献中统一给出，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金会造成什么损害，反而使其名声更大。从这一时期起，美国基金会中心开始定期出版《基金会名录》(*The Foundation Directory*)，内容包括基金会创办的时间、所在地、资金额、联系方式以及创办人的姓名，等等。从此人们就有了一个了解基金会概况的固定窗口。同时，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各种“文化”运动的影响，学术界对市民社会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对第三部门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慈善基金会作为第三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政治与法律方面的学者开始关注慈善事业和慈善基金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有历史学家罗伯特·H·布雷姆纳(Robert H. Bremner)1960年出版的《美国的慈善事业》(*American Philanthropy*)和默尔·科迪(Merle Curti)1963年出版的《美国慈善业的海外行为：历史考察》(*American Philanthropy Abroad: A History*)这两本书。前者论述了美国慈善思想的起源、宗教与慈善、美国慈善业的演变以及美国海内外的慈善行为等问题；后一本书是第一部论述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为人类福祉所做的自愿性非官方慈善行为的著作。但是，就慈善基金会研究而言，这两本书则着墨不多，这可以说是他们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缺陷是，作为美国人，他们对美国的慈善行为溢美之言过多，给人一种美国在拯救世界的感觉，没有能够客观地评价慈善基金会的国际行为。1967年，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等人将他们对慈善行为的历史、基金会的组织架构、涉及基金会的法律与财政问题、基金会与个人、大学、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基金会对文教、卫生、社科、艺术与国际研究等领域的资助等问题分别做了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这就是《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历史、架构、管理与业绩》(*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该书是继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的《慈善基金会》一书后，又一部综合研究美国慈善基金会的著作。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各大慈善基金会的档案开始陆续对公众开放，特别是 1974 年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对外开放后，有关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学术研究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现在，对于慈善基金会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捐助行为都有详细而规范的记录，这些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医学、博物馆、国际研究和各种公共政策问题。各基金会均存有很好的史料记载，有的还存有现代慈善业高层领导人的传记。这些资料为慈善基金会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资料收集工作，爱德华·H·伯曼（Edward H. Berman）于 1983 年写成了《慈善思想：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negie, 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书。伯曼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多年中，以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这三大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慈善基金会所实施的国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他着重研究了以其所选择的三家大型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慈善基金会如何积极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动和资助美国的地区，如何通过资助高等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文教项目来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在这些国家培养亲美人士等问题。通过这些研究，爱德华·H·伯曼得出结论：慈善基金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沉默的伙伴”（Silent Partner）。^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对慈善思想、慈善行为和慈善基金会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研究领域也更加细化。例如，有的学者重新研究了美国慈善思想的起源、慈善与社会精英的关系；有的研究了某一时期慈善基金会的活动及影响；还有的研究了慈善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并向

^① Edward H. Berman,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negie, 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 3.